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企业会计稳健性

——基于准自然实验和文本分析的证据

王宏涛¹, 曹文成¹, 王一鸣²

(1. 西安邮电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2.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增强财务报告可信度、提高信息透明度以及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和文本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升了企业会计稳健性,且在非国有企业和净资产收益率小于6%的企业中正向影响更大;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越多,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述积极程度和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力度越高,披露资产减值类和损益类关键审计事项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提升越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企业信息透明度较低以及审计监督效应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通过提高市场感知的审计质量和报表盈余的审计质量提升了企业会计稳健性。

[关键词] 关键审计事项; 企业会计稳健性; 文本分析; 审计监督效应; 信息透明度; 市场感知; 报表盈余

[中图分类号] F239.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22)04-0043-14

一、引言

高质量的审计质量控制标准体系对提高信息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发展、保护公众利益具有重要作用。长久以来,审计报告保持着“三段论”式格式,重点体现对审计师的免责。随着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政府部门、监管机构 and 投资者对审计师执业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期望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具有更高的信息含量和决策相关性,以降低由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为此,中国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1日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要求审计师披露在审计过程中遇到的重要的、可能存在重大错报、需要特别关注的事项,特别是提供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概念界定、审计师需要遵循的要求以及审计师必须披露的信息内容,以帮助投资者更深入地了解审计过程^[1]。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全面审计报告改革,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审计透明度和审计价值^[2],但目前学者们对新审计准则的实施是否提高了审计报告的信息价值和沟通价值仍存在争议。有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具有积极的市场效应^[3],不仅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质量^[4]和股票流动性^[5],而且可以显著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 and 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6-7]。另有学者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不仅提高了审计报告的信息价值^[8-9]和审计声誉^[10],而且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会使投资者赋予审计师更高的可信度^[8]。据此,一旦企业的会计处理作为关键审计事项出现在企业的审计报告中,这些事项就会与企业不同类型的会计稳健性进行匹配,从而确定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是否对外部审计监督起到针对性作用。然而,也有学者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存在质量参差不齐和模板化的情况^[1,11],关键审计事项涉及内容的广度、深度不均以及关键审计事项构成要素不完整^[12],较少对具体方法、数据或指标的说明也导致公司之间相似事项信息可比性的降低,专业术语的频繁使用也会导致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可读性的下降^[7,13]。此外,审计师可能出于规避审计责任的考虑,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内容并未带来有价值的增量信息^[14]。那么,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是否能够有效发挥外部审计监督作用进而提高企业会计稳健性?是否因企业异质性特征等存在显著差异?又通过何种渠道传导?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收稿日期] 2022-0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XJY020);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22JM-413);西安邮电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CXJWY2020014)

[作者简介] 王宏涛(1975—),男,陕西岐山人,西安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货币理论与政策和金融市场研究;曹文成(1994—),男,陕西安康人,通讯作者,西安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公司金融与公司治理研究, E-mail: 3305236959@qq.com;王一鸣(1966—),男,江西临川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资产定价与风险管理研究。

鉴于此,本文选取2014—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和文本分析方法实证考察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本身及其包含的复杂文本信息出发,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弥补了已有研究采用传统DID模型进行分析未能综合政策时间差异等缺陷,就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展开详细深入分析,拓展了信息披露对企业会计稳健性影响的研究。第二,相较于以往研究^[15],本文不仅立足于上市公司产权性质特征,而且基于上市公司申请配股或增发新股时证监会对公司最近3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要求,分别从产权性质和公司最近3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要求标准深入探究了不同上市公司主体间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稳健性反应的异质性。第三,本文创新性地从市场感知和报表盈余双维度,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方法,进一步揭示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影响企业会计稳健性的“黑箱”,弥补和细化了已有研究在机制分析方面的不足。

二、文献综述

(一)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素

会计稳健性是资本市场上一种重要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原则,已有研究表明会计稳健性是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重要策略之一。会计稳健性体现了公司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对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的处理和确认差异,而且会计稳健性使上市公司对可能出现的经营亏损的估计更加谨慎,并在企业当期财务业绩中进行披露,这种较为稳健的信息披露方式可以合理地预测企业未来收益的可持续性,并预测企业价值。但是,会计稳健性也是一种偏见的衡量,它可能反映也可能不反映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质量。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利益相关者对及时的收益信息和及时的损失信息同样关注^[16]。尽管稳健性是一个衡量偏见的标准,但稳健的信息可以减少资产虚报的机会,而资产虚报是大多数公司倒闭的主要因素。以往研究也表明,两种形式的会计稳健性观点(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都与收益中的税收操纵密切相关^[17]。因此,稳健的会计信息披露将有效抑制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2,18],同时在一系列监督机制或制度安排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缓解代理冲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会计稳健性与委托代理问题一脉相承。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公司治理同样存在着互动关系,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可以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抑制股价的非理性波动,而且可以影响会计信息稳健性,对会计信息的披露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此外,管理层的过度自信不仅会导致公司损失的延迟确认^[19],还会导致披露重大内部控制缺陷的会计稳健性较低,但在重大缺陷更正后会计稳健性会得到提高,高能力经理可以保守地报告以提高合同效率,通过及时报告未来损失来避免代理冲突。

(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经济后果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是审计报告改革以来国内外学者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20]。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审计事项变更,不仅体现在对审计师审计责任的影响,以及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增量对整个资本市场的重要影响上,而且会通过审计报告披露信息质量的更高要求来显著提升审计质量^[21],增强审计报告的信息价值和沟通价值^[3],更好地发挥外部审计的审计监督作用。

有学者发现,报告与错报相关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师比不报告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师责任更小^[22],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增加了审计委员会要求审计师对错报承担责任的程度,强化了审计师对高风险客户的审计责任意识,审计师通过风险溢价调整,事前对此做出了风险补偿。此外,在审计报告错报披露之前,关键审计事项降低了信息使用者对关键审计事项所涉及的财务报告质量的信心^[23]。另有学者认为当审计委员会不活跃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增加了审计师接受激进会计处理的可能性^[24],从而可能对审计师的判断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亦有学者发现审计师和关键审计事项应用细节并不影响银行董事对审计师或审计质量的看法和判断^[25],且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也会鼓励管理者进行投机行为,降低管理者的对冲意愿^[26]。相反,也有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降低了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提高了审计质量^[27],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评估公司业绩,当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负面信息而非正面信息时,投资者对公司财务业绩的评估明显更好^[28]。然而,根据有罪推定理论,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会增加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风险^[12,29],在特定条件下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会增加审计师责任,且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师责任的影响实际上会随着会计准则调整而变化^[30]。与此相关,取消关

键审计事项披露会增加审计师责任,新的报告要求还可能会牺牲审计师判断的水平^[31]。关于资本市场综合表现的研究也表明,投资者未发现审计报告具有信息增量特性,但关键审计事项具有引导审计报告使用者注意力的作用,从而影响个人投资者的信息获取过程。还有少部分学者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企业会计稳健性结合起来,如柳木华和任嘉乐基于实地走访数据,发现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应对力度越大,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水平越高^[15]。

综上,现有关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价值与沟通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是否影响审计师法律责任感知、审计师职业判断、管理层决策、资本市场的综合反应以及投资者投资决策等,目前尚未形成一致性结论,虽有少部分文献分析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15,32],但仍存在诸多有待完善之处。因此,本文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企业会计稳健性结合起来,探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和内在机制,以期丰富相关文献,为实践提供借鉴。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企业会计稳健性

会计稳健性源于不对称的信息环境,与信息不对称一脉相承^[33]。企业的外部投资者和中小股东对会计稳健性具有强烈需求,期望通过会计稳健性来获取更多关于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方面的信息,并以此来缓解或直接抑制信息不对称。作为一种外部审计监督,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的条件下,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有利于满足股东对高质量外部审计的需求,外部审计监督作用的强化可能会对会计稳健性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已有关于会计稳健性的研究中,学者发现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提高会计稳健性^[34],而且会计稳健性的应用对公司有利。首先,稳健性原则通过向公司提供无成本且相对可靠的会计信息而使债权人受益,较高的会计稳健性有助于企业获得银行信贷。其次,会计稳健性对收益的确认比对损失的确认更为严格。会计稳健性不仅可以限制公司的自由现金流,抑制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还可以减少收益偏差^[35]。早期确认损失不仅可以增加收益的稳定性,减少信息不对称,还可以帮助股东识别公司的财务风险并尽早采取措施保护股东利益^[36]。最后,审计师是审计报告的出具者,提高审计报告沟通价值的一个有效方法是通过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来为报告使用者提供对审计师工作的额外见解^[28]。特别地,关键审计事项要求披露重大错报风险和审计师为应对该风险所执行的审计程序,更高的审计披露质量要求审计师要集中更多的审计资源并细化审计工作^[37-38],以获取更多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审计证据的获取依托于审计声誉、审计师独立性和审计质量。审计质量取决于审计师发现重大错报的能力,审计师发现错报的能力反过来又受到审计师能力和审计努力的影响,审计师的报告决策又受到审计师与客户关系的影响^[39]。与此同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又会对审计师起到“保护伞”和“免责声明”的作用^[40],审慎的审计师也会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审计程序并加以详细说明,以规避潜在的诉讼风险^[41-42],反过来促进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的提升。

此外,审计师在执行审计程序时通过与企业管理层就关键审计事项的重大错报风险进行沟通^[43],管理层囿于相关风险披露后的不良市场反应和影响,会通过主动或被动地进行应计科目选择和调整以实现更为稳健的会计处理。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与重大错报风险直接相关,通过研读近些年的审计报告,我们发现,这些重大错报风险事项大比例集中于“收入确认”“资产减值”和“重大交易”等^[1,44],而这些可能的重大错报风险事项与特定的经济活动直接相关,会直接影响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当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时,通过对企业管理层施加披露压力来影响企业管理层的战略决策^[7],最终影响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然而,也有学者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风险信息大多已经在管理者发布的盈余公告、电话会议或者以前年度的年度报告中披露,并没有提供增量信息,也没有引起分析师和投资者的关注^[45]。而且,审计师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时可能存在模糊、避重就轻等行为,事务所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合谋行为会导致部分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较低^[46]。综上所述,基于我国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增强财务报告可信度、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以及增强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作用实践,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₁。

H₁: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会提升企业会计稳健性,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异质性与企业会计稳健性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企业管理者需对股东负责,因此企业所有权结构会对会计稳健性水平产生显著的异质

性影响。国有企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占有半壁江山,政府往往会基于政绩考核而运用行政力量频繁干预国有企业信贷资源配给。相比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缺位且业绩敏感性较弱等问题,非国有企业不仅所有者明确,而且由于面临较大的市场竞争,除了股东会时刻关注管理者的业绩表现以外,企业发展过程中也不时会有增资扩股等需求,故其对于一张亮眼的绩效成绩单有着更高的要求,致使其有更大的动机进行盈余操纵。然而,关键审计事项通过外部审计来传递公司潜在价值信息,会增加非国有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成本和风险,因此,可以预期,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会显著提升非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₂。

H₂: 限定其他条件不变,相比国有企业,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非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申请配股或增发新股,公司最近3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6%,而上市公司为了达到配股或增发条件,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因此净资产收益率小于6%的企业盈余管理动机可能更为强烈。然而,新审计准则实施后,审计师将通过关键审计栏位,针对企业财务报表中较为重要且可能有操纵空间的部分对财务报告使用者进行提醒,如此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作为一种外部审计监督机制,将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操纵的成本和风险,从而使企业对此类操纵行为更加谨慎,进而有助于促进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₃。

H₃: 限定其他条件不变,相比净资产收益率大于6%的企业,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净资产收益率小于6%的企业会计稳健性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三)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文本信息与企业会计稳健性

关键审计事项提炼了财报中已恰当披露的关键信息,是审计师向资本市场投资者传递会计信息的重要渠道^[47]。一方面,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反映了不同的信息沟通含量与不同的审计努力程度^[12],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通过审计质量的传导机制进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另一方面,关键审计事项是按照重要性和审计风险程度决定的^[46],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越多、披露内容越多以及越深入,对管理层的震慑作用越显著^[4],越可能加大投资者合理怀疑的范围,增加企业财务与经营风险被发现的概率^[46],提高企业管理层的机会主义成本,直接或间接缓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发挥外部审计的审计监督效应,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4]。已有研究也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会激发企业的非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动机^[47],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越多,越会增加管理层的信息传递成本,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企业会计稳健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₄。

H₄: 限定其他条件不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越多,企业会计稳健性越高。

关键审计事项作为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晴雨表”,审计师为关键审计事项提供积极的结论性评价,这不仅对缓解信息不对称具有明显的作用,而且能够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弱化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4]。根据心理学的属性框架效应理论,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述反映了审计师对企业相关风险信息进行披露以及信息可靠性的保证程度,将直接影响资本市场信息使用者尤其是分析师对相关会计信息可靠性的信心^[20]。从信号理论来看,审计师为企业财务报告信息提供鉴证服务,外部审计的信息功能可能通过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质量保证机制进一步提高企业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增加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增量^[48]。当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述积极程度越高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不仅能够提高审计质量,还能够为资本市场信息使用者提供更高水平的财务信息,更能为资本市场信息使用者尤其是分析师和审计师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直接的公开渠道^[20]。而且,投资者对关键审计事项段中的结论性评述积极程度词汇更为敏感,特别是当出现“合理的”等结论性词汇时,关键审计事项能够向市场传递更为积极的信息,进而显著提高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6]。由此可以看出,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述积极程度提振了资本市场信息使用者对企业财务信息的信心,在向市场传递增量信息以缓解信息差距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企业会计盈余的信息质量^[11]。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₅。

H₅: 限定其他条件不变,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述的积极程度越高,企业会计稳健性越高。

审计作为重要的公司外部治理监督机制,是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来源,而且关键审计事项应对力度通过审计师专业胜任能力维度直观反映审计项目质量^[15]。根据审计需求的代理理论,较高的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力度代表高质量审计师能够获取更加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审计应对力度越高,越能说明审计投入越多和审计证据越充分有力^[15],能够提高关键审计事项的沟通和信息价值,降低企业与外部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增加向下审计调整的概率,抑制被审计单位的向上盈余管理,提高被审计单位的会计信息质量^[49]。此

外,外部独立审计师高质量的审计应对力度也能够抑制管理者和控股股东等内部管理人的壕堑效应^[50],审计师所付出的审计应对力度越高,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可能重大错报风险的概率越高^[51-52],越会对企业未来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形成威慑,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也越高。因此,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力度越高,不仅越能够反映审计师的职业谨慎态度,而且越能够强化外部审计的审计监督效应,缓解代理冲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提升企业会计稳健性。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₆。

H₆: 限定其他条件不变,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力度越高,企业会计稳健性越高。

已有研究根据对净利润的影响,将关键审计事项具体表征为资产减值、损益、重大交易和其他四大类^[44],这些事项隐藏着管理层及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与重大交易类和其他类关键审计事项相比,资产减值类和损益类事项是最为重要的两大类高频事项^[13],资产减值类和损益类关键审计事项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和极大盈余操纵的便利性,故很可能潜藏着管理者及控股股东等公司内部人的私利行为。现有大量研究也发现,企业管理者为了获取高额薪酬以及维持职业生涯,有很强的动机和能力通过操纵损益及资产减值等方式进行盈余管理^[20,53]。一方面,根据信号传递理论,由于关键审计事项受到管理层对资产减值会计估计的影响,在企业财务状况恶化或经营状态不佳时,会通过企业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被有效反映,同时企业也可能利用资产减值计提操纵利润以粉饰报表^[54]。而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披露资产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将极大地抑制企业利润操纵的动机,向资本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企业信息,同时也会增加企业的利润操纵成本,促进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升。另一方面,由于损益涉及较多的企业会计判断,是投资者关注的重点,也是审计师关注的重点事项。更为重要的是,损益中收入确认受到企业收入确认时点的影响,收入确认的时点又与管理层的重大会计估计相关,也会导致潜在的重大错报风险^[54]。大量文献也发现,管理者和控股股东有很强的动机和能力通过操纵损益进行盈余管理^[55],以达到获取高额薪酬和维持职业生涯的目的。加之收入确认本身极易产生舞弊,对其识别和评估更有助于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由于资产减值类和收入确认类是极具普遍性的两大类关键审计事项,是企业管理层与审计师关注的重点^[32],对这两类关键审计事项进行披露能够增强投资者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关注度,降低企业盈余价值相关性^[56],进一步提升被审计单位的会计稳健性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₇。

H₇: 限定其他条件不变,披露资产减值和损益类关键审计事项会提升企业会计稳健性。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

由于2016年为新审计准则实施的第一年,仅要求A+H交叉上市的上市公司强制披露关键审计事项^[20],故本文利用政策实施后形成的天然处理组和对照组,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选取2014—2020年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考察新审计准则实施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并对初始研究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考虑到ST公司市场交易行为的特殊性,可能会影响企业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行为,故剔除了样本期间ST公司;剔除了金融类企业和数据缺失严重的公司样本;为排除新股效应,剔除当年上市公司。经上述处理后最终得到由2483家上市公司、15278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此外,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了缩尾(Winsor2)处理。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经济金融数据库,采用Stata16.0MP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据的搜集和处理

借鉴柳木华等的研究^[5],本文借助Python语言爬虫程序手工搜集获取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据。本文采用Python语言编写网络爬虫程序,在遵守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上,从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下载样本公司年度报告PDF文件,并转换为TXT格式,手工阅读截取样本公司年度报告中的关键审计事项段,并保留页眉页脚文字以提高文本准确性。然后手工阅读文件以确定是否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个数、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述积极程度、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力度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类型。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类型,本文在弥补以往实证分析对关键审计事项类型划分粗糙这一问题的基础上,参考李晓铮的研究^[44],根据对净利润的影响,将关键审计事项划分为资产减值、损益、重大交易和其他四大类。其中,资产减值类包括应收账款的可回收性、商誉减值、存货跌价、股权投资减值和

其他资产减值;损益类包括收入确认、政府补助、投资收益和成本费用;重大交易类包括股权收购、资产出售、股权出售、关联交易、业绩承诺补助、债务重组和高誉确认;其他类包括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在建工程账面价值、开发支出资本化、存货存在、存货计价与分摊、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股权投资分类、股权投资计量与转换以及其他。

审计应对文本数据中具体包括了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报告时对关键审计事项的了解、评估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对其中的关键控制点进行测试、检查在财务报告中该交易事项的披露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以及企业管理层对关键审计事项进行的相应应计科目调整的稳健性测试等。关于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述积极程度(*CONCLUSION_D*),参考冯晓晴的做法^[20],根据基于 Python 语言得到的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文本数据,本文将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价积极程度划分为:该事项的会计处理是合理恰当的、该事项的会计处理是可以接受的、没有发现该事项的会计处理存在重大问题或异常、无结论性评价四种类型,并将以上四种类型的结论性评价依次赋值为 3、2、1、0,赋值越大,说明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述积极程度越高。

关于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力度(*AUD_FI*),本文借鉴柳木华和任嘉乐的方法^[15],如果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中包含对被审计单位有形资产的现场观察程序或者对被审计单位交易参与方的延伸检查审计程序,则 *AUD_FI* 取 1,否则取 0。采取这种处理方法的原因在于,现场观察和延伸审计检查程序是审计师以付出更高的审计成本为代价获取更高质量审计证据的应对方法,因而可以代表更高的审计应对力度。

(三)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会计稳健性(*Cscore*)。本文采用 Khan 和 Watts 提出的 *Cscore* 计量方法来衡量企业的会计稳健性^[57]。在 Basu 模型的基础上,在 *Cscore* 模型中引入资产负债率、市值账面比和公司规模,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frac{EPS_{i,t}}{P_{i,t}} = \mu_0 + \mu_2 R_{i,t} + \mu_3 DR_{i,t} + \mu_4 DR_{i,t} \times R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Gscore_{i,t} = \mu_1 = \alpha_1 + \alpha_2 SIZE_{i,t} + \alpha_3 MB_{i,t} + \alpha_4 LEV_{i,t} \quad (2)$$

$$Cscore_{i,t} = \mu_3 = \beta_1 + \beta_2 SIZE_{i,t} + \beta_3 MB_{i,t} + \beta_4 LEV_{i,t} \quad (3)$$

$$\frac{EPS_{i,t}}{P_{i,t}} = \mu_1 + \mu_2 DR_{i,t} + RET_{i,t} (\alpha_1 + \alpha_2 SIZE_{i,t} + \alpha_3 MB_{i,t} + \alpha_4 LEV_{i,t}) + DR_{i,t} \times R_{i,t} (\beta_1 + \beta_2 SIZE_{i,t} + \beta_3 MB_{i,t} + \beta_4 LEV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Gscore* 为会计盈余对好消息的反应;*Cscore* 为会计稳健性水平;*EPS_{i,t}* 为公司 *i* 在 *t* 年的每股价格;*p_{i,t}* 为公司 *i* 在 *t* 年初的每股价格;*R_{i,t}* 为公司 *i* 在 *t* 年的每股收益,若 *R_{i,t}* < 0,则 *DR_{i,t}* 取 1,反之 *DR_{i,t}* 取 0;*SIZE_{i,t}* 为公司 *i* 在 *t* 年公司规模的対数;*MB_{i,t}* 为公司 *i* 在 *t* 年市值账面比;*LEV_{i,t}* 为公司 *i* 在 *t* 年的资产负债率。为将投资机会信息融入会计稳健性,本文首先将模型(2)和模型(3)代入模型(1),并根据会计稳健性模型中交互项的基本处理方法,再将各单项式代入模型(1)得到模型(4),然后将模型(4)中求得的回归系数参数值代入模型(3),最后可求得公司的年度 *Cscore* 值。*Cscore* 值越大,说明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越强,反之,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越弱。

2. 核心解释变量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DKAM*)。不同于传统的双重差分模型,本文研究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DKAM* 变量类似于传统 DID 模型中的交互项。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键审计事项,则 *DKAM* 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关键审计事项披露(*DKAM*)刻画了不同上市公司在不同时间点上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典型事实。

3. 控制变量

参考王木之和李丹^[58]、柳木华等^[5]的研究,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公司性质(*SOE*)、每股收益(*EPS*)、总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市值账面比(*MB*)、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HOLD*)、会计师事务所规模(*BIG4*)、被分析师跟踪(*ANALYST*)、盈余管理柔性(*EMFLEX*)、会计信息质量(*AIQ*)、内部控制质量(*ICQ*)、两职合一(*DUAL*)和董事会规模(*BOARD*)。控制变量的定义及说明见表 1。

(四) 模型设定

由于新审计准则采用了“两步走”的落实策略^[59],不同的上市公司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没有明确的时间间断点,因此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以综合政策的时间差异,并设置如下计量回归模型(5)来检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Cscore_{i,t} = \alpha_0 + \alpha_1 DKAM_{i,t} + \beta X_{i,t} + 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5)$$

其中, $Cscore_{i,t}$ 为公司 i 在 t 年的会计稳健性, $DKAM_{i,t}$ 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变量,该变量相当于传统双重差分模型中的交互项, $X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集合, u_i 为个体固定效应, γ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如果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变量 $DKAM_{i,t}$ 的估计系数 α_1 的符号方向显著为正,则说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有利于提高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假设 H_1 成立。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 多元回归分析

表2为假设 H_1 的检验结果。列(1)的回归结果显示,加入控制变量之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DKAM$ 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会提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初步验证了研究假设 H_1 。列(2)~列(5)为逐次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DKAM$) 的回归系数均在1%以上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具有促进效应。从经济显著性上看,以列(5)纳入全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为例,关键审计事项披露 ($DKAM$) 的回归系数表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每增加1个单位,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水平增加13.39%。以上结果说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升了企业会计稳健性,支持了研究假设 H_1 。

表3为异质性检验结果。其中,列(1)和列(2)列示的按照产权性质分组的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非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验证了研究假设 H_2 。这是因为,关键审计事项需要通过外部的审计监督功能来影响企业会计稳健性,而在国有企业中行政力量较为强硬^[60],关键审计事项对外部审计监督功能的强化受到抑制,难以实现提高会计稳健性的目的。列(3)和

表1 控制变量定义表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SIZE	公司规模	公司总资产,取对数
SOE	公司性质	公司为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
ROA	总资产收益率	公司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
LEV	资产负债率	公司年末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EPS	每股收益	公司净利润与年末总股数之比
MB	市值账面比	公司市值与资产总额之比
TOPHOLD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BIG4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	国际四大取值为1,否则为0
ANALYST	被分析师跟踪	被分析师跟踪人数加1,取对数
EMFLEX	盈余管理柔性	公司应收账款和存货之和与总资产之比
AIQ	会计信息质量	DeFranco 等的模型估计得到,该公司相对于同行业其他公司的年度会计信息质量
ICQ	内部控制质量	内部控制有效取1,否则取0
DUAL	两职合一	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则取1,否则取0
BOARD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人数,取对数

表2 多元回归结果

变量	(1) CScore	(2) CScore	(3) CScore	(4) CScore	(5) CScore
DKAM	0.1076 *** (10.653)	0.1171 *** (11.020)	0.1169 *** (10.966)	0.1335 *** (12.580)	0.1339 *** (12.612)
EPS		-0.1560 *** (-18.638)	-0.1709 *** (-14.515)	-0.0886 *** (-7.391)	-0.0884 *** (-7.375)
MB		0.0155 *** (4.697)	0.0133 *** (3.991)	0.0113 *** (3.280)	0.0112 *** (3.252)
LEV		0.1464 *** (4.921)	0.1899 *** (5.998)	0.4353 *** (12.982)	0.4351 *** (12.974)
TOPHOLD		-0.1960 *** (-4.786)	-0.1665 *** (-3.970)	-0.0685 * (-1.739)	-0.0701 * (-1.779)
SOE			-0.0390 *** (-2.993)	0.0035 (0.288)	0.0006 (0.052)
ROA			0.2386 ** (2.246)	0.0432 ** (2.416)	0.0429 *** (3.413)
BIG4			0.0845 *** (3.979)	0.0142 * (1.691)	0.0136 *** (2.655)
DECIMA				0.0237 (0.699)	0.0244 (0.720)
SIZE				-0.1138 *** (-20.413)	-0.1138 *** (-20.360)
ANALYST				0.0132 *** (2.724)	0.0129 *** (2.675)
ICQ				0.0134 *** (3.534)	0.0143 *** (3.571)
AIQ				-0.5099 (-1.249)	-0.5037 (-1.234)
BOARD					-0.0257 (-0.995)
DUAL					-0.0298 ** (-2.414)
Constant	0.0380 *** (4.120)	0.0193 *** (2.775)	0.0234 * (1.932)	2.3791 *** (19.294)	2.4401 *** (18.497)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5278	15278	15278	15278	15278
R-squared	0.396	0.396	0.392	0.365	0.413

注:括号中为检验 t 值,通过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 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列(4)为按照净资产收益率分组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净资产收益率小于6%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更为显著,验证了研究假设H₃。

表4为文本信息的检验结果。列(1)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交互项(DKAM × KAM)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上市公司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越多,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提升越显著,支持了假设H₄。

表4中列(2)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结论性评述积极程度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交互项(DKAM × CONCLUSION_D)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关键审计事项的结论性评述积极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提升企业会计稳健性,假设H₅得到验证。

表4中列(3)为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力度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交互项(DKAM × AUD_FI)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力度较大的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更为显著。原因在于,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力度越高,越能够缓解代理冲突,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提升企业会计稳健性,支持了假设H₆。

表4 文本信息检验结果

变量	(1) 数量	(2) 结论性评述积极程度	(3) 审计应对力度	(4) 资产减值类	(5) 损益类	(6) 重大交易类	(7) 其他类
DKAM	0.1028 *** (3.145)	0.1045 *** (5.932)	0.1013 *** (6.013)	0.1067 *** (13.507)	0.3026 *** (18.546)	0.0718 (1.251)	0.0459 * (1.676)
KAM	0.0072 *** (2.587)						
DKAM × KAM	0.2549 *** (2.721)						
CONCLUSION_D		0.0194 (1.529)					
DKAM × CONCLUSION_D		0.0048 *** (3.633)					
AUD_FI			0.1872 ** (2.411)				
DKAM × AUD_FI			0.0562 ** (2.504)				
Constant	2.7206 *** (15.836)	2.3960 *** (12.656)	2.4122 *** (12.734)	1.2510 *** (3.508)	1.0937 *** (3.566)	1.0390 *** (3.000)	1.2514 *** (3.09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9828	9828	9828	3351	2879	76	3522
R-squared	0.453	0.398	0.423	0.315	0.309	0.436	0.368

表4中列(4)—列(7)为关键审计事项类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资产减值类、损益类和其他类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DKAM)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而重大交易类的回归系数则不显著,且资产减值类和损益类的估计系数和t值均显著大于其他类的估计系数和t值,这也说明披露资产减值类和损益类尤其是披露损益类关键审计事项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提升作用更显著,验证了研究假设H₇。对重大交易类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在于:针对同一被审计单位所涉及的重大交易类关键审计事项大部分都是非常规事项,每年确定的关键审计事项可能不尽相同。如对某项并购股权交易,在并购当年可辨认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及商誉的确认和计量可能构成关键审计事项,但在以后期间关键审计事项可能变为商誉的减值测试,且其只能反映被审计单位当年的情况。此外,包括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环境的变化,如宏观经济形势、内部控制缺陷整改或者会计准则的调整等,都会使得非常规性的重大交易类关键审计事项所体现的以服务于投资者为中心的信息价值有所缺失,无法向资本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个性化信息,进而使得其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不显著。

(二) 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本文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分别通过安慰剂检验、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更换被解释变量和剔除境内外共同上市公司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

为了验证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并非偶然或随机性因素所致,本文按照上市公司是否披露关键审计事项,随机生成政策冲击模拟处理组和对照组,并重复 500 次进行反事实估计,结果表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的确并非是由于偶然或随机性因素等不可观测因素干扰所造成的,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真实可靠性。限于篇幅,结果未列示,备索。

2.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在进行双重差分分析之前采用反事实法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表明新审计准则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满足同趋势的假设条件。限于篇幅,结果未列示,备索。

3.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为有效消除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本文在进行多期双重差分之前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来消除内生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公司规模(*SIZE*)、公司性质(*SOE*)、每股收益(*EPS*)、总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市值账面比(*MB*)、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HOLD*)、会计师事务所规模(*BIG4*)、被分析师跟踪(*ANALYST*)、盈余管理柔性(*EMFLEX*)、会计信息质量(*AIQ*)、内部控制质量(*ICQ*)、两职合一(*DUAL*)和董事会规模(*BOARD*)作为协变量,对上市公司是否披露关键审计事项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 1:1 不放回匹配,最终得到 14295 个样本。然后基于匹配后的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限于篇幅,结果未列示,备索。

4. 替换被解释变量

前述采用 Khan 和 Watts 提出的 Cscore 计量方法来衡量企业会计稳健性^[57],在这里本文分别采用 Basu 模型和 ACF 模型来衡量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结果(未列示,备索)表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会提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水平,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5. 剔除境内外共同上市公司

由于分步骤执行的审计准则变更会影响跨境上市公司,考虑到会计信息准则变更的影响,参考徐硕正和张兵的研究^[59],剔除境内外共同上市的样本公司后重新进行回归。检验结果(未列示,备索)再次支持了本文假设。

六、进一步分析

(一) 企业信息透明度

前述理论分析表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向资本市场传达的信息更容易被感知,公司面临的信息环境和治理水平会增加企业的机会主义成本,进而提升公司信息透明度。公司信息环境和治理水平可以很好地刻画公司信息透明度。因此,本文从信息环境和公司治理两方面来刻画信息透明度。

本文以分析师关注度(*ANALYST*)来衡量企业的信息环境,这是由于分析师关注度越高,意味着向市场传达的信息越多,公司的信息传递渠道越通畅。此外,本文选取股权制衡度(*BALANCE*)来衡量公司的内部治理水平,选取机构投资者持股(*INSTITUTE*)来衡量公司的外部治理水平。这是因为,股权制衡度可以反映其他股东的话语权,可以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监督,而且机构投资者作为投资人可以采用投票等方式参与公司治理,约束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信息环境(*ANALYST*)、内部治理(*BALANCE*)和外部治理(*INSTITUTE*)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DKAM*)的交互项分别纳入基准模型中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出,交互项 $DKAM \times ANALYST$ 、 $DKAM \times BALANCE$ 和 $DKAM \times INSTITUTE$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提升作用在信息透明度较低的公司中更为显著,与前述理论分析一致。

(二) 审计监督效应

审计师是审计报告制度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而审计师声誉和审计独立性等能够切实反映审计师在审计过

程中的职业判断和审计投入力度,通过增强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能力,相应的审计监督效应也会对企业管理层施加披露压力,进而影响企业管理层的战略决策,抑制其机会主义动机,增加企业信息透明度。因此,本文基于审计监督视角,从审计声誉(*BIG4*)、审计独立(*ATENURE*)、审计迟滞(*TLAGA*)和审计收费(*TCOST*)维度来刻画审计监督效应。

审计声誉(*BIG4*)以是否被国际“四大”审计来衡量,事务所的规模越大,所面临的诉讼风险也越大,越重视审计声誉和提升自身品牌效应,也越愿意提高审计质量,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审计独立(*ATENURE*)以审计师任期来衡量,审计师任期越长,说明审计质量越高。审计师任期是审计师独立性的侧面反映,审计师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审计师任期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管理层的自利性动机。与频繁变更审计师的公司相比,审计师未变更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更强^[61],而且审计师任期越长,越有助于对被审计单位业务的熟悉和专业胜任能力的发挥,相应的审计质量也因审计独立性的提高而提高。审计迟滞(*TLAGA*)以审计师签字时滞时间来衡量,审计师签字时滞为上一年会计年度结束日与本年度审计师签署审计报告日的时间间隔,为日历天数,即计算时滞期时需考虑公告期间的节假日。审计收费(*TCOST*)依据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来衡量,审计费用是否发生变化主要取决于注册会计师对审计风险变化的判断,当审计风险增加时,审计师将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进行风险补偿。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审计声誉(*BIG4*)、审计独立(*ATENURE*)、审计迟滞(*TLAGA*)和审计收费(*TCOST*)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DKAM*)的交互项分别纳入基准模型中进行回归。从表6中列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交互项 *DKAM* × *BIG4*、*DKAM* × *ATENURE*、*DKAM* × *TLAGA* 和 *DKAM* × *TCOS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提升作用在审计监督效应较强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

(三)作用机制检验:基于市场感知和报表盈余双维度

由于公认会计原则固有的灵活性,嵌入会计准则中的会计自由裁量权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盈余管理的机会,为企业管理层的机会主义择时行为提供了便利。除了运用不同的会计方法来记录会计数字外,管理层还可以采用真正的盈余管理策略来改变运营、投资或融资交易的时间或结构,从而改变公司的业绩结果。前述研究表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够增加企业审计报告的信息价值和沟通价值,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公司其累计超额收益率在披露前后的变化显著高于未披露公司^[3,48]。在资本市场的市场情绪和羊群效应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关键审计事项本身也会通过减少企业的机会主义择时行为来抑制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空间,进而使得企业管理层更多地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来传递关于未来盈余的信息^[47],提高企业会计稳健性。因此,本文认

表5 信息透明度检验结果

变量	(1) C <i>Score</i>	(2) C <i>Score</i>	(3) C <i>Score</i>
<i>DKAM</i>	0.2024 *** (13.320)	0.1445 *** (8.972)	0.1165 *** (5.174)
<i>ANALYST</i>	0.0047 *** (3.390)		
<i>DKAM</i> × <i>ANALYST</i>	-0.0071 *** (-6.391)		
<i>BALANCE</i>		-0.0104 (-0.737)	
<i>DKAM</i> × <i>BALANCE</i>		-0.0161 * (-1.953)	
<i>INSTITUTE</i>			0.0001 (0.386)
<i>DKAM</i> × <i>INSTITUTE</i>			-0.0003 ** (-2.433)
<i>Constant</i>	1.9119 *** (15.312)	1.9779 *** (15.776)	1.9775 *** (15.801)
<i>Controls</i>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5278	15278	15278
R-squared	0.312	0.297	0.415

表6 审计监督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审计声誉	(2) 审计独立	(3) 审计迟滞	(4) 审计收费
<i>DKAM</i>	0.0845 ** (2.260)	0.1235 *** (7.215)	0.0032 *** (3.057)	0.1436 *** (13.625)
<i>BIG4</i>	0.0647 * (1.845)			
<i>DKAM</i> × <i>BIG4</i>	0.0608 ** (2.567)			
<i>ATENURE</i>		0.0023 (1.490)		
<i>DKAM</i> × <i>ATENURE</i>		0.0023 * (1.719)		
<i>TLAGA</i>			-0.0001 (-0.264)	
<i>DKAM</i> × <i>TLAGA</i>			0.0014 ** (2.526)	
<i>TCOST</i>				0.0000 *** (8.707)
<i>DKAM</i> × <i>TCOST</i>				0.0019 * (1.750)
<i>Constant</i>	2.1756 *** (15.479)	2.1632 *** (15.503)	2.1686 *** (15.061)	1.7977 *** (13.321)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5278	15278	15278	15278
R-squared	0.315	0.403	0.386	0.327

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会通过提高市场感知的审计质量和报表盈余的审计质量,进而提升企业会计稳健性。其背后的逻辑是:一方面,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依照重要性和审计风险程度排序并列,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本身在审计报告中就具有强调作用,会降低管理层的机会主义择时行为,进而显著提高市场感知的审计质量。同时,随着时间推移,报表盈余的审计质量与市场感知的审计质量的背离将逐渐消失^[11],通过市场感知向市场传递更为积极的信号,也会引起投资人更多的关注^[46],进而增加企业的机会主义成本。此外,在有效市场假设条件下,审计师通过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审计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等审计项目个性化信息,降低企业关键项目的重大错报风险,从而引发一系列资本市场反应,在市场情绪、羊群效应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可以使股票价格进一步反映企业内部信息,增加企业隐瞒和重大错报的成本,对企业管理层施加披露压力,提高市场感知的审计质量。另一方面,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增量效应也提高了审计工作的透明度,推动了企业内部控制建设,通过企业管理层对应计科目的调整来提升审计报告信息增量。此外,在监管机构和审计人员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审查越来越严格的背景下,也将敦促管理者更多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来代替应计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达成调整财务报告盈余的目标^[62-63],这也会使管理层的机会主义择时行为与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形成联动效应,进而负向影响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正向影响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增强管理层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向资本市场传递未来盈余信息的非机会主义动机,提高报表盈余的审计质量。为检验上述逻辑的存在性,本文设置如下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

$$Cscore_{i,t} = \alpha_0 + \alpha_1 DKAM_{i,t} + \beta X_{i,t} + 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6)$$

$$Mediator_{i,t} = \vartheta_0 + \vartheta_1 DKAM_{i,t} + \beta X_{i,t} + 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7)$$

$$Cscore_{i,t} = \theta_0 + \theta_1 DKAM_{i,t} + \alpha_2 Mediator_{i,t} + \beta X_{i,t} + 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8)$$

其中, $Mediator_{i,t}$ 为中介变量,代表企业 i 在 t 年的累计超额收益率(CAR)、应计盈余管理(DA)和真实盈余管理(REM)变量。参考张金丹等^[11]、王艳艳等^[3]的研究,本文以审计报告日为事件日,同时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提前泄露导致的提前反映问题和涨跌停板限制下的反应不足与反应延迟现象^[11],选取审计报告日前30天和后15天为事件窗口,利用市场模型计算窗口期内企业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CAR(T-30, T+15)$,以此来衡量企业管理层的机会主义择时行为,累计超额收益率(CAR)的值越大,说明企业的机会主义择时行为越不明显,企业市场感知的审计质量越高。企业报表盈余的审计质量通过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来反映。参考张金丹等^[11]的研究,本文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DA)以基于修正的 Jones 模型计算得到企业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来衡量,企业操控性应计盈余的绝对值越大,说明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越严重,信息透明度越低,反之,说明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越弱,信息透明度越高。参考 Roychowdhury^[64]和丁方飞等^[47]的研究,本文通过分别计算经营活动的异常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酌量性费用得到真实盈余管理(REM),REM指标的绝对值越大,代表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表7中列(1)和列(2)为市场感知的审计质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根据中介效应原理可知,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会降低企业的机会主义择时行为,提高企业被市场感知的审计质量,从而提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

表7中列(2)—列(6)为报表盈余的审计质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根据中介效应原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通过降低机会主义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和增强非机会主义的真正盈余管理行为以提高报表盈余的审计质量,进而提高会计稳健性。上述结果表明,提高市场感知的审计质量和报表盈余的审计质量是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高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核心机制。

表7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CAR	(2) CScore	(3) DA	(4) CScore	(5) REM	(6) CScore
DKAM	0.0377 *** (6.747)	0.1305 *** (12.967)	-0.0139 *** (-10.829)	0.1337 *** (12.541)	0.0052 ** (2.576)	0.1331 *** (12.539)
CAR		0.1019 *** (6.206)				
DA				-0.0131 ** (-2.198)		
REM						0.1295 *** (3.193)
Constant	0.3278 *** (4.574)	2.4065 *** (18.247)	0.1829 *** (10.857)	2.4448 *** (18.489)	0.1826 *** (5.946)	2.4150 *** (18.28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5278	15278	15278	15278	15278	15278
R-squared	0.416	0.398	0.306	0.392	0.372	0.391

注:括号中为检验 t 值,过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

七、结论性评述

审计报告对增强财务信息的可信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2014—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样本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和文本分析法,实证检验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表明:(1)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升了企业会计稳健性,且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2)在非国有企业和净资产收益率小于6%的企业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正向影响更大;(3)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多,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述积极程度越高、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应对力度越高,以及披露资产减值和损益类关键审计事项时,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提升越明显;(4)进一步考虑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审计监督效应的影响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提升作用在企业信息透明度较低以及审计监督效应较强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5)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通过降低管理层机会主义择时行为以提高市场感知的审计质量,通过降低企业机会主义的应计盈余管理和增强非机会主义动机的真实盈余管理以提高报表盈余的审计质量,进而提升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水平。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政策制定者要进一步细化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细则,并提供披露格式与文本表达的指导,为用户提供更多有关审计师工作的信息,从而提高审计报告的交流价值和沟通价值。其次,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增加了审计师的审计难度和资源占有,面临的诉讼风险也随之增加,审计师要注重专业素养和职业胜任能力的提升,增强自身独立性,尤其是要加大对被审计单位业务的熟悉程度,结合自身职业判断,及时发现企业可能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事项并对关键审计事项进行及时、准确的表达,提升审计报告共有的核心信息并引起参与者的共鸣。再次,企业管理层就企业可能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关键审计事项,要及时与审计师沟通交流意见,通过改变管理层决策行为来对应计科目进行及时调整,进一步提升审计报告的信息价值和沟通价值。最后,投资者作为审计报告信息的重要使用者,要发挥对标准制定者、审计师和企业管理层的影响效应,推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信息治理效应。

本文可能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关键审计事项本身还包括扩展性内容,如关键审计事项的内容精确词频、关键审计事项的内容扩展词频以及关键审计事项应对扩展词频等,未来可进一步采用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方法进行分析深入探讨。第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的语调也可能影响审计沟通的效果,审计师可能无法规避企业管理层异常积极语调操纵暗含的未来风险,进而降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增量信息价值。未来可将其与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语调结合起来,针对上市公司的年报和半年报中与管理层经营讨论与分析相关的数据资料,识别企业管理层异常语调操纵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信息增量效应的影响。第三,随着未来政策时间窗口的扩大,可通过多年面板数据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经济后果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例如,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不同行业抑或是不同财务特点上市公司的行业共有特质类和非行业共有特质类关键审计事项进行探讨,以及与分析师盈余预测问题相结合,可能更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然而,目前的研究仍缺少上述问题的交叉,因此,笔者认为这些领域在未来几年或许是一片蓝海。

参考文献:

- [1]李奇凤,路军伟.关键审计事项段的特征具有信息含量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7年报审计的经验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1(2):30-40.
- [2]鄢翔,张人方,黄俊.关键事项审计报告准则的溢出效应研究[J].审计研究,2018(6):73-80.
- [3]王艳艳,许锐,王成龙,等.关键审计事项段能够提高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吗?[J].会计研究,2018(6):86-93.
- [4]朱泽钢,姜丽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作用研究——基于DID模型与文本分析[J].经济经纬,2021(1):124-133.
- [5]柳木华,任嘉乐,郭振.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价值——基于股票流动性视角[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1(3):21-32.
- [6]张继勋,倪古强,张广冬.关键审计事项的结论性评价与投资者的投资判断[J].会计研究,2019(7):90-96.
- [7]Christensen B E, Glover S M, Wolfe C J. Do critical audit matter paragraphs in the audit report change nonprofessional investors' decision to invest? [J]. Auditing-A Journal of Prattice & Theory, 2014, 33(4): 71-93.
- [8]Moroney R, Phang S, Xiao X. When do investors value key audit matters? [J].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21, 30(1): 63-82.
- [9]冉明东,徐耀珍.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改进研究——基于我国审计报告改革试点样本的分析[J].审计研究,2017(5):62-69.
- [10]Knechel W, Krishnan G, Pevzner M, et al. Audit quality: Insights from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J]. Auditing-A Journal of Prattice & Theory, 2013, 32(1): 385-421.

- [11] 张金丹,路军,李连华. 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吗?——报表盈余和市场感知双维度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2019(6):85-91.
- [12] 田高良,陈匡宇,齐保全. 会计师事务所所有基于关键审计事项的审计风格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披露新版审计报告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2021(11):160-177.
- [13] 路军,张金丹. 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初步研究——来自A+H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 会计研究,2018(2):83-89.
- [14] 李奇凤,刘洪渭. 关键审计事项:上市公司审计师责任感知与披露决策的实证分析[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174-184.
- [15] 柳木华,任嘉乐. 关键审计事项应对与会计稳健性——基于实地走访程序的经验证据[J]. 证券市场导报,2019(12):30-39.
- [16] Lara J M G, Osma B G, Penalva F. Board of directors' characteristics and conditional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Spanish evidence[J].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07, 16(4):727-755.
- [17] Heltzer W. Conservatism and book-tax differenc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Finance, 2009, 24(3):469-504.
- [18] 张子健,李小林. A股与H股市场关键审计事项反应的比较研究[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9(4):11-21.
- [19] Ahmed A S, Duellman S.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board of director characteristics: An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7, 43(2):411-437.
- [20] 冯晓晴. 关键审计事项影响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吗?——基于结论性评价视角[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1(4):56-68.
- [21] 韩冬梅,张继勋.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审计人员感知的审计责任[J]. 审计研究,2018(4):70-76.
- [22] Brasel K, Doxey M, Grenier J, et al. Risk disclosure preceding negative outcomes: The effects of reporting critical audit matters on judgments of auditor liability[J]. Accounting Review, 2016, 91(5):1345-1362.
- [23] Kachelmeier S, Rinkus D, Schmidt J, et al. The forewarning effect of critical audit matter disclosures involving measurement uncertainty[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20, 37(4):2186-2212.
- [24] Ratzinger-Sakel N, Theis J. Does considering key audit matters affect auditor judgment performance? [J]. Corporate Ownership & Control, 2017, 17(1):196-210.
- [25] Boolaky P, Quick R. Bank directors' perceptions of expanded auditor's repor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ting, 2016, 20(2):158-174.
- [26] Bentley J, Lambert T, Wang E. The effect of increased audit disclosure on managers' real operating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disclosing critical audit matter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20, 96(1):39.
- [27] 杨明增,张钦成,王子涵. 审计报告新准则实施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2016年A+H股上市公司审计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 审计研究,2018(5):74-81.
- [28] Köhler A, Ratzinger-Sakel N, Theis J. The effects of key audit matters on the auditor's report's communicative value: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 and non-professional investors[J]. Accounting in Europe, 2020, 17(2):105-128.
- [29] 许静静,朱松,周萍. A股关键审计事项全面披露特征及政策效果研究——基于2018年首次全面披露的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6):46-57.
- [30] Gimbar C, Hansen B, Ozlanski M E. The effects of critical audit matter paragraphs and accounting standard precision on auditor liability[J]. Accounting Review, 2016, 91(6):1629-1646.
- [31] Vinson J, Robertson J, Cockrell C. The effects of critical audit matter removal and duration on jurors' assessments of auditor negligence[J]. 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19, 38(3):183-202.
- [32] 喻凯,余意.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稳健性影响研究[J]. 财会通讯,2021(7):40-43.
- [33] Watts R, Zimmerman J, Zimmerman J. Agency problems, auditi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Some evidence[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26(3):613-633.
- [34] 甄红线,凌方,景跃霞. “参与治理”还是“选择治理”?——基于机构投资者与会计稳健性内生关系的检验[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1(9):2198-2217.
- [35] Chen Q, Hemmer T, Zhang 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incentives for earnings management[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7, 45(3):541-565.
- [36] Kim J, Zhang L.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Firm-level evidence[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6, 33(1):412-441.
- [37] 韩冬梅,张继勋,杨雪梅. 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价与审计师感知的审计责任——一项实验证据[J]. 审计研究,2020(6):51-58.
- [38] 陈丽红,易冰心,殷旻昊,等. 行业专家审计师会充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吗? [J]. 会计研究,2021(2):164-175.
- [39] DeAngelo L E.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1, 3(3):183-199.
- [40] 黄亮华,汤晓燕. 关键审计事项:审计师的“免责声明”?——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差异化[J]. 财经研究,2021(2):139-153.
- [41] 刘颖斐,张小虎. 企业诉讼风险与审计收费——基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视角[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6):33-45.
- [42] 潘克勤.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改变了审计师的审计责任意识吗?——基于审计定价视角[J]. 经济经纬,2020(3):108-116.
- [43] 李晓月,肖翔,代庆会. 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属性与关键审计事项沟通——基于不同方向盈余管理的综合分析[J]. 管理学报,2020(2):76-87.
- [44] 李晓铮. 深市公司首次全面执行关键审计事项准则情况分析[J]. 证券市场导报,2018(11):66-69.
- [45] Rapley E T, Robertson J C, Smith J L. The effects of disclosing critical audit matters and auditor tenure on nonprofessional investors' judgment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21, 40(5):106847.
- [46] 付强,廖益兴. 审计独立性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客户重要性视角[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2(1):53-68.

- [47] 丁方飞,陈智宇,李苏,等.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非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基于两种盈余管理方式转换视角的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1(5):35-46.
- [48] 徐展,盛思思,顾奋玲. 关键审计事项、风险感知与权益资本成本[J]. 金融经济研究,2021(5):133-147.
- [49] Xiao T, Geng C, Yuan C. How audit effort affects audit quality: An audit process and audit output perspective[J].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20,13(1):109-127.
- [50] Fan J P H, Wong T J. Do external auditors perform a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in emerging markets? Evidence from East Asi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5,43(1):35-72.
- [51] 蔡利,唐嘉尉,蔡春. 公允价值计量、盈余管理与审计师应对策略[J]. 会计研究,2018(11):85-91.
- [52] 翟胜宝,许浩然,刘耀淞,等.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风险应对[J]. 管理世界,2017(10):51-65.
- [53] Bergstresser D, Philippon T. CEO incentiv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80(3):511-529.
- [54] 杨隽萍,邹超逸. 关键审计事项、股权性质与权益资本成本——来自资产减值和收入确认事项的证据[J]. 中国注册会计师,2022(4):26-33.
- [55] Chen S, Wang Y, Zhao Z. Regulatory incentives for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asset impairment reversals in Chin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 Finance,2009,24(4):589-620.
- [56] 陈丽红,张呈,张龙平,等.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盈余价值相关性[J]. 审计研究,2019(3):65-74.
- [57] Khan M, Watts R L. Estimation and empirical properties of a firm-year measure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9,48(2):132-150.
- [58] 王木之,李丹. 新审计报告和股价同步性[J]. 会计研究,2019(1):86-92.
- [59] 徐硕正,张兵. 新审计报告与资本市场的信息反应——来自股价同步性和股价预测能力双维度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3):45-57.
- [60] 刘运国,吴小蒙,蒋涛. 产权性质、债务融资与会计稳健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2010(1):43-50.
- [61] 谢盛纹,刘杨晖. 审计师变更、前任审计师任期和会计信息可比性[J]. 审计研究,2016(2):82-89.
- [62] 王福胜,吉姗姗,程富. 盈余管理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研究——基于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比较视角[J]. 南开管理评论,2014(2):95-106.
- [63] 李增福,郑友环. 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方式比较——基于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的研究[J]. 财经研究,2010(6):80-89.
- [64] Roychowdhury S.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6,42(3):335-370.

[责任编辑:刘 茜]

Key Audit Matters Disclosure and Corporate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Evidence Based on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and Textual Analysis

WANG Hongtao¹, CAO Wencheng¹, WANG Yimi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Xi'an 71006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is important to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of financial reports, improv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corporat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sampl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14 to 2020, we empirically tested the impact of key audit matter disclosure on corporate accounting robustness using multi-period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and textu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enhances corporate accounting robustness, and the positive effect is greater in non-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with returns on net assets less than 6%; the higher the number of key audit matter disclosures, the higher the positive degree of concluding comments on key audit matters and the strength of audit responses to key audit matters, as well as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in asset impairment category and profit and loss category enhance the level of corporate accounting robustnes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firms with lower transparency of corporate information and stronger audit oversight effect;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test indicates that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improves corporate accounting soundness by enhancing the audit quality of market perception and the audit quality of reported surplus.

Key Words: key audit matters; corporate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textual analysis; audit oversight effects;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market perception; reported surplus